

學術論文

社群媒體對當代民主國家的機會與挑戰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social media bring to mod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葉姵紋 *Pei-Wen Yeh*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博士生

*PhD student of Department East Asian Studies**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社群媒體對於當代民主國家產生諸多影響，有學者認為，現今社群媒體的發展已出現兩面刃效應：正面部分，社群媒體能為民主政治帶來議題資訊揭露的快速；負面部分，社群媒體助長了監控機制，危及個人自主。關於此論點，學者 Francis Fukuyama 於 2020 年 1 月出版的《民主季刊》，有了更進一步的說明。本文也針對社群媒體究竟對當代民主國家產生何種機會與挑戰進行分析，並進一步探討社群媒體如何強化威權韌性與衝擊民主政治，以及觀察威權體制與民主國家面對社群媒體的因應方式。

本文研究發現，社群媒體在過去扮演了提供人們資訊並賦予民間社會權力的正向角色。然而，現今社群媒體操縱特定的議題來塑造社會輿論，

airiti

侵害人民隱私權，成為了影響威權體制與民主國家政治信息運營的工具，亦即只要掌握社群媒體就能操控人們的情緒與偏好，對於強化威權國家的威權韌性與衝擊自由民主政治的運作帶來極大的影響。

Social media bring a lot of impacts to mod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nowadays have created the effect of double-edged sword. On the positive side, social media can instantly disclose information for issues in democratic politics. On the negative side, social media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monitoring mechanism and endanger personal autonomy. About this argument, scholar Francis Fukuyama, provided a further explanation in “Democracy Quarterly” published in January 2020. The article also carried out analysis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social media bring to mod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as well as further discussed how social media strengthe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and affect democratic politics.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also observed the coping methods towards social media in authoritarian regime and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The study reveals social media played a positive role of providing people information and empowering the civil society in the past. However, social media nowadays manipulate specific issues to create public opinions and invade people’s right of privacy. It has become a tool that affects the operation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in authoritarian regime and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That is, people’s emotion and preference can be manipulated as long as you can control the social media, which brings great impact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and the operat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關鍵詞：社群媒體、威權韌性、民主政治

Keywords: Social Media,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Democratic Politics

壹、前言

世界政治三十年：「科技」從支持民主的朋友轉變成分裂社會的敵人？

—Francis Fukuyama¹

處於新興科技不斷湧現的數位資訊時代，現今社群媒體的發展對於當代民主國家也出現了兩面刃的效應：首先，社群媒體能為民主政治帶來議題資訊揭露的快速；然而，在負面部分，社群媒體也助長了監控機制，危及個人自主。² 關於這項論點，學者 Francis Fukuyama 於 2020 年 1 月出版的《民主季刊》中，說明自 1990 年以後的三十年時間，世界政治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有著更進一步的討論。

學者 Francis Fukuyama 認為，民主國家在近來三十年發生的第一個變化為「民主衰退」，亦即威權獨裁國家試圖挑戰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而世界政治這三十年來的第二個重大變化，則涉及了本文所提及之科技領域，尤其是網絡的外部性與社群媒體的興起，今日的全球網絡已分為由「中國控制的封閉式互聯網」，以及「美國少數私人公司運營的開放網絡」所掌控，其中前者係支持中國的專制政府，而後者則服務於控制它的私營公司的利益。

其實早於 2016 年，科技專欄作家基恩（Andrew Keen）即曾在 politico magazine 網站針對「社群媒體」發文並提出警示：「社群媒體的發展極致，讓網路陷入一片『壞資訊之海』，缺乏檢證與問責的中介者之後，真實不再重要，選民失去辨識真假的能力。」³

¹ Francis Fukuyama, “30 Years of World Politics: What Has Change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1, No. 1, January (2020), p. 14.

² Ronald J. Deibert, “Three Painful Truths About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0, No. 1, January 2019, pp. 25-39.

³ 〈歐巴馬到川普的社群奇謀：社群媒體與政治變奏曲〉，《天下雜誌》，2016年7月15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410>。

是以，「社群媒體」(Social Media) 應用究竟對當代民主國家產生何種機會與挑戰？抑或對人類生活、公共事務的參與產生何種生活方式的改變？甚至進一步對於人類閱讀習慣、獲取資訊方式產生了何種影響？而與本篇文章主題相關的研究成果，學術界與實務界早已屢有討論，茲將相關學者意見與資料臚列如下：

學者 Larry Diamond 認為，社群媒體和相關數位技術加劇了威權主義侵犯個人隱私的力量，被視為對西方自由民主穩定與人類自由的重大威脅。其中可以觀察到，近年中國的數位監控與社會控制項目正在迅速擴大，這些技術發展有可能助長後現代極權主義，而這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社群媒體」給當代民主國家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⁴

另外，學者 Ronald J. Deibert 在 2019 年 1 月的《民主季刊》，亦曾明確表達「社群媒體」擁有三個痛苦的真相：首先，社群媒體的商業模式，對於消費者個人數據有著不懈的監視；第二，大眾卻默認且允許社群媒體上述這種監視，而且是驚人的數量；最後，社群媒體雖不與威權主義相容，實際上卻成為威權主義最有力的縱容者。⁵

甚至學者 Christopher Walker 於 2019 年 4 月的《民主季刊》也發表了類似的看法：「多年來，數位技術已經改變了人們理解和與周圍世界互動的方式，社群媒體在提供新聞和信息方面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生活在一個不以開放為導向，而是以『操縱』為主導的時代。⁶」

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如 Christopher Walker、Shanthi Kalathil 以及 Jessica Ludwig，也談論到社群媒體對於威權體制如何影響西方自由民主的未來，因社群媒體的興起促使了當代的威權體制國家，能跨越國界進行審查，並進一步操縱，從而破壞民主制度。而威權國家的手段從城市安全維護的監

⁴ Larry Diamond, "The Road to Digital Unfreedom: The Threat of Postmodern Total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0, No. 1(2019), p. 20.

⁵ 同註 2，頁 25-26。

⁶ Christopher Walker, "The Era of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0, No. 2(2019), p. 172.

視技術，以至利用社群媒體平台宣傳國家的虛假信息，其掌控技術甚至已遍布全球。⁷

綜合上面眾多學者之論述，綜覽以網路與新型 ICT 為特徵的「社群媒體 (Social Media)」等新興科技，相較於傳統的大眾媒體有著不少明顯的優勢，雖能為政府帶來組織數位轉型與改革的機會，成為強化公共治理效率與效能的重要工具，卻也替當代社會帶來不可預計的影響。以政治競爭領域為例，2016 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唐納·川普 (Donald John Trump) 直接將 Twitter 等社群媒體，當作攻擊對手的投石器，不惜抵制《華盛頓郵報》。而台灣則有 2014 年的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其團隊運用社群媒體做為凝聚選民人氣的主戰場，讓公眾能透過社群媒體參與選舉、反抗既有政治權力的統治，進而使柯文哲贏得台北市長的選舉。⁸ 以及 2018 年，由前高雄市長韓國瑜激起的一股韓流，開啟迄今方興未艾的政治網紅風潮。

由此可知，社群媒體的興起對於人類社會活動產生的影響是一把雙面刃，而在《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一書中，作者甚至將不當的數據應用比喻為「安靜的恐怖主義」。⁹ 惟即便大眾極為關注且強調社群媒體對當代民主國家的機會與挑戰，然截至目前為止，與本文主題相關的研究成果，仍缺乏強而有力的資料顯示，有關社群媒體的實證研究是否真的會對當代民主國家造成衝擊？甚至現有文獻皆從西方觀點探討社群媒體對於威權體制的幫助，而甚少從亞洲觀點進行分析與觀察。

具體而言，本篇文章結合文獻檢閱分析的方式試圖進行以下探討：新興科技中的「社群媒體」可能對當代民主國家造成哪些影響？產生了何種機會與挑戰？並進一步探討社群媒體如何強化威權韌性與衝擊民主政

⁷ Christopher Walker, Shanthi Kalathil, Jessica Ludwig, "The Cutting Edge of Sharp Pow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1, No. 1(2020), pp. 124-137.

⁸ 邱聖雯，《社群媒體與選舉：以 2014 年臺北市長選舉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論文，2017) (未出版)。

⁹ Cathy O'Neil 著，許瑞宋譯，《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臺北：大寫出版，2017)。

治？並在最後結論處，歸納並反思造成這些科技風險、衝擊背後的成因，以及可能的因應方向，以供相關政策實務與研究參考。

貳、社群媒體可能對當代民主國家造成的影響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發展，以及傳播媒介不斷地更迭、轉變，在訊息大量數位化傳輸的當下，新興科技除了借重社群媒體的資料庫進行結構分析，促使社群媒體相對於傳統媒體而言，更能夠突破國家疆界，幫助訊息接收者有宛如親身體驗的影像或圖片，這樣的體驗感讓大眾對於政府行政或政策的不滿能夠更快速傳播，甚至強化，並且不受限制地跨時、跨界流動。¹⁰ 是以，社群媒體不僅對於公民社會帶來更大的質變，同時更影響了當代民主國家有關政策和議題的發酵速度與範圍。

是以，欲探討社群媒體可能對於當代民主國家造成的相關影響，吾人認為可以從以下兩方面進行討論：

首先，近年來，人們開始相信社群媒體對於公民社會與當代民主國家造成影響，確信民主國家以及非國家行為者皆利用、操縱特定的議題來塑造社會輿論，以社群媒體作為改變社會大眾想法，以及影響民主國家政治信息運營的工具。學者 Jamie Bartlett 曾在《人民與科技：互聯網如何殺死民主（以及我們如何拯救民主）》（*The People Vs Tech: How the internet is killing democracy (and how we save it)*）一書中明確指出，社群媒體擁有操縱與「隱藏的說服力」。¹¹

以國際間案例而言，2016年6月，英國舉辦脫歐公投，有研究指出選民投下脫歐一票的顯著原因，係由於脫歐陣營刻意釋放資訊扭曲的文宣，導致選民接收

¹⁰ 康世昊，〈社群媒體上的勞工行動主義I—臺灣鐵路勞工的 Facebook 與 LINE 效益觀初探〉，收錄於廖達琪主編，《網路崛起的社會運動對臺灣的影響》（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209-210。

¹¹ Jamie Bartlett, *The People Vs Tech: How the internet is killing democracy (and how we save it)* (New York: Dutton, 2018), p. 30.

到錯誤政治資訊而做出後悔的投票選擇。¹² 以及美國政府曾針對其 2016 年總統大選，作出俄羅斯介選的正式調查報告，指控俄羅斯總統弗拉迪米爾·普丁 (Vladimir Putin) 運用資訊作戰干預，在社群媒體上散播謠言，企圖使唐納·川普 (Donald John Trump) 贏得總統寶座，該份報告指出普丁總統與俄羅斯政府對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有著明顯的偏好。¹³

2020 年 12 月 1 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簡稱北約) 公布委託研究的《北約 2030：團結迎向新時代》(NATO 2030: United for a New Era) 政策報告中，¹⁴ 更直接點名俄羅斯、中國運用科技對民主國家政治運作構成威脅的討論，北約報告的應對措施是保持歐洲對中國在科技上優勢，以及保護電腦網絡安全及保障歐洲在基礎建設方面的利益。

另一方面，以社群媒體作為影響政治信息運營的工具，不僅有上述國際案例，國內學者也陸續發現、研究社群媒體如何被政治人物應用在政治選舉的領域。例如 2016 年，我國第九屆不分區年輕世代的立法委員，在問政期間以社群媒體進行對話的溝通策略，也致力於展現社群媒體的豐富資訊性，雖然對於社群媒體的掌握仍不夠熟練，仍試圖以社群媒體與公眾進行雙向溝通。¹⁵

甚至我國學者沈有忠亦曾以社群媒體是否對政治產生影響，作一個基礎性的研究，¹⁶ 其以政治人物臉書經營作為研究主題，分析政治人物的臉書動態發文，並對立法委員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受到太陽花學運的影響，對於立法委員來說，與選民情感交流、選區服務，的確是較為常見的臉書動態。

¹² 林琮紘，《資訊扭曲在英國選民脫歐抉擇之角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未出版)，頁109-110。

¹³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of United States, "Assessing Russian Activities and Intentions in Recent US Elections," January 6, 2017, section ii.

¹⁴ "NATO 2030: United for a New Era," NATO, November 25, 2020,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0/12/pdf/201201-Reflection-Group-Final-Report-Uni.pdf.

¹⁵ 呂文瑄，《政治人物的社群媒體對話溝通策略分析：以第九屆不分區立法委員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碩士學位學程論文，2018年)(未出版)。

¹⁶ 沈有忠，《政治人物臉書經營初探》，收錄於廖達琪主編，《網路崛起的社會運動對臺灣的影響》(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281-320。

由以上案例，在在呈現出社群媒體能夠影響當代民主國家政策和議題的發酵速度與範圍，而社群媒體中匯聚的群眾數量與資訊流量一旦到達一定的引爆點後，它就可能產生創造事件的關鍵政治力量。

其次，新興科技發展與社群媒體的普及雖引領社會走向便捷、舒適，惟亦伴隨著潛藏的資訊安全危機，由網路安全引發的威脅層出不窮，而可能對人民產生侵害隱私權的疑慮，學者 Eileen Donahoe 與 Megan MacDuffee Metzger 即為文指出，我們需要一個全球治理框架來應對與社群媒體、人工智慧相關的廣泛社會挑戰，包括對隱私的威脅、訊息流通，以及獲得平等保護和非歧視的權利。¹⁷ 另外，學者卡萊 (Kathleen M. Carley) 作為最早探討「社群網路安全」科學的先鋒，¹⁸ 認為社群媒體安全係「一個新興的科學領域，聚焦於描繪、理解並預測網路時代中人類行為轉變，與隨之而來的社會、文化及政治變化，並在以網路為媒介的資訊環境中，面臨正在發生或迫切且變動的社群網路威脅下，建立維持社會以其本質續存所需的網路基礎設施。」¹⁹

從上述兩方面來看，由於社群媒體的創新使用，如今社群媒體平台已成為政治公關與公眾溝通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亦使得臺灣政治抗議事件進入社會事件與科技整合運用的新階段，科技特色不但讓行動者的媒體使用創新，並且提供另類論述的發聲機會，形成對抗議運動新的意義。²⁰ 另一方面，學者也發現實際上社群媒體的政治資訊傳播呈現迴聲室 (echo chamber) 的情況，亦即政治傾向影響個人討論、分享政治資訊的對象，導致政治謠言透過社群媒體在具同樣政治傾向

¹⁷ Eileen Donahoe, Megan MacDuffee Metzg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0, No. 2(April 2019), p. 115.

¹⁸ 卡萊 (Kathleen M. Carley)、貝斯科 (David Beskow)、黃依歆，〈論社群網路安全—新興國家安全威脅〉，《海軍學術雙月刊》，54 卷 2 期，2020 年 4 月，頁 132-143。

¹⁹ Kathleen M. Carley et al., "Social Cyber-Security," in *Social, Cultural, and Behavioral Modeling: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BPBRiMS 2018, Washington, DC, USA, July 10-13, 2018, Proceedings*, ed. Halil Bisgin et al. (New York: Springer, 2018), pp.389-394.

²⁰ 劉時君、蘇蘅，〈政治抗議事件中媒體的創新使用與實踐：以太陽花運動為例〉，《資訊社會研究》，第 33 期 (2017 年 7 月)，頁 147。

的團體中傳播。²¹

是以，時值今日的社群媒體已開始與深度偽造、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結合，導致「眼見不一定為憑、耳聽不一定為真」，其中我們熟知的假新聞，除了影響大眾的認知與立場之外，其影響力也擴及至國家政治與軍事安全層面，形成一種非傳統安全議題，應及早因應，避免負面效應發酵。

參、社群媒體如何強化威權韌性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 Andrew J. Nathan 曾提出「威權韌性」一詞，此名詞源自於研究中國的專家與民主理論學者，曾期望中共政權能加入民主化的第三波，然而其後中共政權不僅未見崩潰，反而更加進行了自我鞏固。根據這個現象，Andrew J. Nathan 曾於 2003 年撰文認為：「中國沒有出現民主轉型，反而是完成了由極權主義向經典威權政權的轉型，並且似乎變得越來越穩定了。」²² 而其後，美國知名研究中國與亞洲事務專家 David Shambaugh 提出了：「中共政權通過學習和適應，將有潛力去克服或遏制包括腐敗在內等諸多問題的看法。」²³ 這樣的論點。

雖然有些學者不認同以上說法，認為「威權主義韌性」高估了威權體制的實力，以及忽略其內部的脆弱性，²⁴ 甚至 Andrew J. Nathan 與 David Shambaugh 兩位學者也陸續翻轉其對中國威權平穩運作的看法，認為韌性威權具有調適能力的圖景是截然相反的。例如 2009 年，Andrew J. Nathan 提出「中國未來最有可能的轉型方式仍然將是天安門事件那樣的模式。」

²¹ 杜兆倫，《謠言分藍綠？政治傾向與社群媒體謠言傳播之關聯性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論文，2018 年）（未出版）。

²² Andrew J.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 6.

²³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pp. 1-234.

²⁴ 曾敬涵，《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意識形態、合法性與凝聚力》（香港：香港城市大學，2016 年），頁 146。

²⁵ 以及 2016 年，David Shambaugh 撰文指出「如果中國保持 2009 年以來的強硬威權路線，就將不可避免地像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一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社會會變得更加不穩定以及難以預測」²⁶ 等不同論點。

然而，以上學者對於「中國威權政權即將崩潰」的論點解析，隨著新興科技中「社群媒體」的出現，開始顯得侷促不安，陸續有學者提出，新興科技作為政府治理的工具，其潛能是極為巨大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社群媒體」的技術為專制與非自由主義政權帶來了許多特別的好處。以往認為威權體制之所以崩潰，是因為威權國家不了解民心向背，低估了人民的力量，然而現今「社群媒體」的出現，反而成為國家控制人民與社會的利器。是以，運用新興科技治理國家，對於現今威權國家的領導人來說，反而是一項極大的優勢，學者 Christopher Walker 甚至認為，新興科技助長了威權主義，導致數位威權主義的興起。²⁷

近年來，印尼政府依靠社群媒體等新興科技大力掃蕩同性戀，在 Facebook、Tumblr 等社群平台輕鬆找出特定性傾向的對象加以打擊，此舉比在街頭突襲同性戀場所更為有效。

而中國當局自從習近平主席於 2012 年上台以來，越來越多地利用社群媒體、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等領域的技術創新來監控其人民生活 and 活動，根據數據與資料顯示，中國使用互聯網的用戶已達 8 億人口。²⁸ 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習近平主席優先控制了網絡信息領域，嚴厲打擊互聯網上的顛覆性言論，以期阻止中國政權的合法性面臨其他國家的挑戰，並一直開發新的手段來更廣泛地監管網絡空間。例如 2020 年，中國社會

²⁵ Andrew J. Nathan, "Authoritarian Imperman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0, No. 3(2003), pp. 37-40.

²⁶ David Shambaugh, *China's Fu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p. 1-224.

²⁷ Christopher Walker, "What Is the 'Sharp Pow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9, No. 3(2018), pp. 9-23.

²⁸ Jon Russell, "China Reaches 800 Million Internet Users," *TechCrunch*, August 21, 2018, <https://techcrunch.com/2018/08/21/china-reaches-800-million-internet-users/>.

信用體系全面啟用上路；²⁹ 2019年初，Google 為了重返中國市場，籌備了蜻蜓計畫；³⁰ 以及美國 Apple 公司曾在 2018 年將中國 iCloud 業務轉交由中國境內儲存等例子。³¹

為此，學者 Xiao Qiang 在 2019 年 1 月的《民主季刊》中，表達了中國正在建設世界上第一個「反應迅速的暴政」，甚至可能是「數位極權主義國家」的論述：「中國政府由於其經濟上的成功和對社會的更多控制而變得越來越自信、越驕傲自大，中國威權政府的數位化正在擴大國家監測，以及擁有控制該國 14 億人口的能力。」³²

由上述資料可以知道，當代威權主義國家，只要掌握新興科技工具與大數據資料，設定演算法並運作社群媒體，就能夠操縱與監控大眾的情緒與偏好，從而製造民粹主義強人興起的沃土。以上在在顯示，社群媒體與機器學習原本誕生於尊重言論與溝通自由的民主社會，然而新興科技非但沒有幫助獨裁政權走向滅亡，反而成為促進威權主義的助力，當威權政府利用社群媒體並輔以機器學習，可能反而助長專制政權壓制民主。

雖然另有一些學者持相反意見，例如中東學者 Adel Iskandar 曾研究埃及的青年狀態，認為埃及青年正在使用數位科技等藝術類作品，例如諷刺漫畫、惡趣味視頻或反諷影片，去對抗與破壞埃及威權政府的宣傳。³³ 儘管這類表達被認為缺乏政治上的共鳴或結果，但在埃及青年選擇強烈抵制國家支持的選舉與政治參與的背景下，此舉仍無法忽視社群媒體除了具有

²⁹ 〈從檔案袋到信用評分 中國是否正走向『奧威爾式』監控社會〉，《BBC 中文網》，2018 年 10 月 17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5886126>。

³⁰ 〈谷歌內部資料洩露更多『中國計劃』細節〉，《BBC 中文網》，2018 年 10 月 10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45815647>。

³¹ 〈臉書 VS 蘋果：用戶隱私引發的論戰〉，《BBC 中文網》，2018 年 4 月 3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3626263>。

³² Xiao Qiang, "The Road to Digital Unfreedom: President Xi's Surveillance Stat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0, No. 1 (January 2019), pp. 53-67.

³³ Adel Iskandar, "Egyptian Youth's Digital Dissen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0, No. 3 (July 2019), p. 154.

強化威權韌性的特點外，亦有衝擊威權體制的反面可能存在。

肆、社群媒體如何衝擊民主政治

隨著新興科技時代開展出全新的資訊傳遞生態，現行的資訊傳播模式也從傳統媒體的一對多模式，逐漸轉變為新型社群媒體形式的多對多模式。是以，學者 Fenton 認為，其實學界也多半認同，網路新興科技等社群媒體的出現，確實有助於民主的傳播與發展。³⁴

然而，學者 Bimber 對於「網路有助於民主發展」此一說法，卻是有所批判的，³⁵ Bimber 認為人們總是為了確認自己的想法，便積極尋找與自己原先信念相符的訊息，亦即所謂「同溫層」，當資訊科技、社群媒體的運用程度越高時，人們就越容易從其中獲取與自己相似的意見，並進而鞏固自己的信念。

而學者 Francis Fukuyama 於 2021 年 4 月出版的《民主季刊》中更進一步探討了「社群媒體如何衝擊民主政治」此一現象，³⁶ Francis Fukuyama 撰文提醒我們，大型互聯網平臺為了改變重大政治結果，特意放大或壓制某些聲音的力量，如此舉動已對民主政治構成嚴重威脅。Francis Fukuyama 認為，欲減少社群媒體的負面力量所帶來的衝擊，解決方法有以下四項：一、利用反壟斷立法解散 Facebook 和 Google 等公司；二、加強政府對於平台內容的監管、監督；三、增加數據資料便攜性，或授權使用者能選擇在各平台之間移動個人數據；以及最後，實施隱私立法來限制平臺如何使

³⁴ Natalie Fenton, "Drowning or waving? New media,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N. Fenton (Ed.), *New media, old news: Journalism &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Los Angeles, CA: Sage, 2010), p. 6.

³⁵ Bruce Bimber, "Inform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America: The search for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4, No. 1 (March 2001), p. 58.

³⁶ Francis Fukuyama, "Making the Internet Safe for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2, No. 2(April 2021), pp. 37-44.

用他們收集到的用戶數據。

無獨有偶的，學者 Larry Diamond 在同年 4 月也提出類似看法，Larry Diamond 反省在十年前，其認為「社群媒體」在對自由和民主的影響中主要被視為「解放技術」；然而，時值今日，「社群媒體」越來越多地助長專制和濫用權力。是以，Larry Diamond 提出，很少有社會科學家能像加拿大政治學家 Ronald Deibert 那樣揭露互聯網的風險和危險，³⁷ Ronald Deibert 說明：「人類社會已經到了一個『轉捩點』，如果我們不對數位技術和部署這些技術的公司和政府實行民主控制，我們將面臨不可逆轉的人類自由和隱私損失的風險。」³⁸

由上述資料可以瞭解，社群媒體和相關科技工具因擁有增強人類權力和解放的強大力量，被視為是對民主穩定和人類自由的重大威脅，當威權主義的力量從科技發展的革命中獲取利益，面對中國政府的數位監控、社群媒體審查和社會控制項目正迅速發展的同時，社群媒體也為當代民主國家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³⁹ 學者 Noam Lupu、Mariana V. Ramírez Bustamante、Elizabeth J. Zechmeister 即為文表示，政策制定者仍必須關注社群媒體可能對當代民主國家造成的不良影響：「包括政治兩極化和加深公眾對民主制度的不信任。」⁴⁰

而其他在當代民主國家中，有關公民社會的政治表達權利、選舉投票機制與集體決策方式等等運行，皆會產生大量的數據與資料，隨著新興科技中「社群媒體」與「人工智慧」的技術嵌入，新興科技產業似乎有一個特殊的邏輯，目的在蒐集更多的用戶訊息及其所創造的數位內容，並從中

³⁷ Larry Diamond, "Rebooting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2, No. 2(April 2021), pp. 179-183.

³⁸ Ronald J. Deibert, *Reset: Reclaiming the Internet for Civil Society*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2020), p. 419.

³⁹ 同註 4，頁 20。

⁴⁰ Noam Lupu, Mariana V. Ramírez Bustamante, Elizabeth J. Zechmeister, "Social Media Disruption: Messaging Mistrust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1, No. 3(July 2020), p. 160.

分析與推論各種情報。而未來的民主政治發展很可能成為，誰掌握了數據資料，就等於掌握政治權力的時代。

伍、結論：威權體制與民主國家面對社群媒體衝擊的因應方式

2011年，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從北非席捲到阿拉伯地區，引發了「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曾經使許多人相信網路擁有的科技力量可以推倒威權、深化民主。然而，2016年，俄羅斯干預美國總統大選，以及英國脫歐時相關假訊息、資訊戰的衝擊，讓歐美國家真正意識到，現今社群媒體扮演重要角色，應協助民主國家建立民主防衛機制，對抗威權進化。

根據本文研究發現，當代民主國家的民主政治發展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尤其新興科技的技術進步雖然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繁榮發展，但同時它也是一把雙面刃，「社群媒體」的負面影響，將可能對人類社會造成多面向衝擊：諸如操縱特定的議題來塑造社會輿論，對人民產生侵害隱私權的疑慮，抑或是成為影響威權體制與民主國家政治信息運營的工具。

誠然，新興科技中的「社群媒體」在過去扮演了提供人們資訊並賦予民間社會權力的正向角色，被公民社會寄予厚望，認為「社群媒體」的網路發聲平台，可以翻轉過去較為單向言論的傳統媒體型態，傳遞多元社會價值。然而在現今，許多學者卻同意「社群媒體」越來越被大眾視為是社會弊端之所在，⁴¹ 成為新時代超越國家的利維坦（Leviathan），對於當代威權體制與民主國家皆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觀諸歷史業已證明，人類面對新興科技的日新月異，雖然能夠享受技術進步帶來的福利，但同時也會產生「黑科技」的既視感。2018年，英國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濫用科技，以非法取得、分析臉書 5000

⁴¹ 同註 2，頁 25-26。

萬筆用戶資料，⁴² 在各社群媒體平台投放各式假新聞及個人化廣告，進一步企圖影響民主體制之選民抉擇，此皆為「社群媒體」等新興科技的興盛為人類社會帶來的許多問題，讓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定位與格局。

當然，如果人類懂得善用技術，「社群媒體」其實也具有整合不同領域、專長的網路公民及網路社群的力量，甚至是幫助政府組織與公眾互動等功能。是以，無論係威權體制或民主國家面對「社群媒體」衝擊的因應方式，除了在滿足民眾需求和促進國家發展等方面，皆需要深入探究威權體制或民主政治在新興科技時代的機遇與挑戰，在趨利避害中促進政府運行機制的優化。因之，如何利用社群媒體服務於人類社會，最終還需要依靠人類自身的政治智慧、民主協商和共同決策，以及認真看待並回應相關挑戰。

責任編輯：傅家鈺

⁴² 〈『臉書』個人用戶數據被濫用？『劍橋分析』在全球有何影響〉，《BBC 中文網》，2018年3月21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3482767>。